
疫情背景下日本供应链的重塑及前景分析*

陈友骏 赵磊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本已脆弱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网络重塑已成定局。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中日经济合作必要性，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中日两国长期产业分工合作形成的供应链体系面临威胁，正在遭受来自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战略博弈以及技术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多重冲击。面对中美战略竞争与经济科技竞争，日本考虑重组供应链网络，提升供应链弹性及推动核心产业的本土回迁与多元分散供应。后疫情时代，日本将对华采取“有限合作型”的供应链合作模式，在数字与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推动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体系，加强与“共享价值观国家”的供应链合作。对此，中国应从建立现代化供应链体系、提升核心技术研发实力、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强化区域融合发展等层面入手，应对日本的供应链政策调整。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供应链重塑 中日经济合作 中美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31.3；F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1)05-0109-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与中日关系研究”（编号：18BGJ008）。

2020年伊始，世界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疫情对中日双方的经贸往来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国内政府与产业界主张提升供应链弹性、构建以东盟为核心的多元供应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之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对华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政策，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开始收紧对华涉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政策，转而选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择在疫情防控、高端制造等领域加速布局供应链的“本土化”和“多元化”，以“摆脱对单一特定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危机，中日两国需要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双方在加强疾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重塑产业分工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而且，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等，这些商业要素始终是日本对华开展贸易投资活动的主要考量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新冠肺炎疫情可防可控的主要经济大国，在部署“疫情防控常态化”与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政策后，展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潜力与市场扩张活力。举个例子，作为日本主要产业之一的汽车业，在全球市场受疫情冲击不断萎缩的背景下，唯独在华销售额保持了稳定甚至略有增长。这反映了中国市场在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中的重要地位。以“贸易立国”与“自由贸易旗手”自居的日本，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是选择与美国同流，对华实行“脱钩”战略，构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还是与中国一道继续维系原有供应链的完整与紧密衔接，维护多边自由贸易规则与市场开放原则，共同反对“去全球化”，共建东亚地区经贸命运共同体？这或许是日本今后对外战略布局面临的重大课题与挑战。

一、供应链的概念梳理与中日供应链分工的特征

供应链合作是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集中体现了两国产业部门在国际分工体系与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协调角色和能力分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供应链安全问题被放大，成为各国日渐重视的政治、经济乃至安全议题。尤其是事关医药卫生、高端制造业的供应安全，美日印等国相继出台了相关产业政策并扩大资金支持，鼓励战略产业供应链的本土化及长供应链条的分散化与短缩化，驱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组。这一动向将不可避免地将对中日供应链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一）供应链的概念与特征

供应链（supply chains）指的是产品在生产流通环节中，涉及提供产品或服务组成部分的各个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①“供应链”这一概念与产业经

^① 关于供应链的概念梳理，参见陈国权：《供应链管理》，《中国软科学》1999 年第 10 期，第 101—102 页；王金圣：《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理论的演变》，《财贸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64—66 页；韩硕祥：《发挥标准化积极作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20 年第 6 期，第 6—8 页。

济学中提到的“产业链”概念有诸多相同之处，一般而言，产业链相对宏观，不仅包括供应链的结构属性，还包含价值链的价值属性。本文提到的产业链一般仅指其结构属性层面，与供应链概念等同。^① 具体来看，形成供应链的企业间关系分为“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两种。“纵向关系”是指产品制造与服务的供应链从上游到下游的关系，“横向关系”则是指联合开发产品和技术的同行业公司之间的关系。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供应链的国际分工和复杂化程度不断提升。^② 全球供应链体系正是基于全球化进程加速、市场分工逻辑推动以及技术交通革新等条件，而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的产品供需网络结构。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有四个特性：完整性、全球性、层级性以及可塑性。（1）“完整性”是指，全球供应链是一体化和严密组合化的结构网络，一旦其核心结构遭到破坏，整个网络将处于瘫痪、崩溃状态乃至分散重组。例如，在工业领域有着重要应用、被称为“工业维生素”的稀土，如果其供应出现问题，将使一系列依赖稀土原料供应的科技产业陷入停摆或困境，甚至导致整个供应链发生断裂、技术迭代受阻。（2）“全球性”与全球化生产分工密不可分，越是精密复杂的产品，越离不开全球化的产业分工逻辑。比如在技术极为复杂、分工极为精细的芯片半导体领域，从设计架构、原料供应到加工制造，再到最终的封装测试环节，微小的一块芯片涉及美国、荷兰、日本、中国台湾等全球各地几百甚至上千家企业的参与及合作。换言之，离开了全球化技术分工模式与市场消费的驱动，如此复杂精密的商品生产将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产品升级也会无从谈起。（3）“层级性”是指一国或一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的地位与关键程度，在供应链网络层级中所处位置较高的国家或企业，对供应链有着更大的掌控力与更多的利润价值分配空间。比如，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其在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的上榜公司以科技医药、能源金融企业为主，公司平均利润额约为70亿美元，远高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41亿美元）。^③（4）全球供应链

^① 关于产业链的概念梳理，参见刘志彪：《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9年第12期，第5—7页。

^②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3年版』、2021年6月、90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③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财富中文网，2020年8月10日，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0-08/10/content_372148.htm [2020-10-21]。

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塑造、可变更的，一国在供应链中的层级地位会随着其产业结构优化或生产能力弱化而上升或者下降。从 1990 年至 2018 年，工业制品在中国对外出口中的占比从 74.4% 跃升到 94.6%，初级产品的占比则从 25.6% 下降到 5.4%，^① 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层级地位从低到高的历史性改善。

（二）中日供应链体系的分工模式与特征

长期以来，中日贸易往来与投资流动，在两国之间形成了中国负责加工组装和出售较低附加值的中间产品、日本则更多提供高附加值的精密零部件与高技术产品的供应链分工模式。以 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界，中国凭借较低的土地价格、高性价比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包容的经济政治制度、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多方面优势，逐渐成为全球供应网络的重要一员乃至“世界制造中心”。而日本作为高度发达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高质量服务、现代化管理经验及风险管控等领域独树一帜。具体到工业制品领域，在东亚供应网络中，中国是中间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和零部件制造加工中心，日本则主要负责供应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零部件，是一些重要科技产业及核心技术的关键掌控者。

这种分工模式在中日之间围绕半导体产业的合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芯片半导体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是发展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涉及计算机、智能手机、数控机床以及工业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品的核心元器件。仅 2018 年，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就达 6655.21 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口总额的 31% 以上，远远超过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进口额，是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其中，以芯片半导体为核心的电子器件技术、计算机通信技术与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等领域的进口占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接近 80%，^② 对外依存度极高。反观日本，在芯片半导体的制造设备、原材料等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尤其是在全球芯片产业的潜力增长点——汽车自动化芯片和物联网相关芯片领域，日本有其特殊的技术积淀和创新优势。^③ 2020 年，日本对华出口额达 1412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长了 4.9%，其中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增加了 9.0%，半导体产业相关的电气

①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https://data.cnki.net/NewHome/Index\[2020-08-16\]](https://data.cnki.net/NewHome/Index[2020-08-16])。

② 同上。

③ 冯昭奎：《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赶超与创新——兼谈对加快中国芯片技术发展的思考》，《日本学刊》2018 年第 6 期，第 22—23 页。

设备及化学制品增长也较为显著,^① 占日本对华出口总额的 38%, 一般机械、电气设备、化学制品分列日本对华出口产品结构占比的前三位^②。由此足可见中日在芯片领域的贸易联系紧密程度。

就中日间供应链体系的具体特征来看, 其一, 中日两国位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不同层级。从宏观视角分析中日贸易与供应链分工不难发现: 两国间形成了中国负责加工和组装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 而日本控制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重要零部件生产供给的供应链分工特征; 中国处于供应链中加工制造的中端环节, 日本则在核心零部件、电子元器件等高附加值的供应环节占据较大优势, 中日分属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不同层级。以半导体相关产业为例, 2021 年 7 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发布的《世界贸易投资报告》显示: 2020 年日本对外出口 (通关基准) 6400 亿美元, 比 2019 年下降了 9.3%, 自国外进口 6341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2.0%。从商品类别看, 日本半导体相关行业的出口表现强劲, 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增长 4.4%, 约为 236 亿美元, 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增长 3.9%, 约为 381 亿美元, 汽车出口减少 18.1%, 约为 894 亿美元 (其中环保车增长 9.8%, 约为 212 亿美元), 半导体及汽车产业合计约为 1511 亿美元, 占日本对外出口总额的 24% 左右。而同年度, 中国的半导体相关进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33.3%, 半导体产业海外依存度较高。^③

其二, 中日之间的供应链体系相互嵌合、互补性强。中日两国优势互补、分工明确, 在不同的层级有各自的优势。从疫情发生前的 2019 年中日双边贸易数据来看, 机电产品, 纺织品及原料,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是中国对日出口中占比排名前三的商品, 合计占比约为 64.6%, 尤其机电产品所占比重最大, 仅此一项就占日本自华进口总额的近一半。其中,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日本供应精密电子零部件与核心元器件, 经在华日企利用中国的高性价比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土地以及宽松的政策优势, 加工制造后返销日本或供应全球市场的产品。再看日本对华出口商品, 占比排名前四的分别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运输设备以及光学医疗设备, 四项合计占比约为 72.1%,

①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21 年版』、2021 年 7 月 29 日、21 頁、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2021/no1.pdf [2021-08-11]。

②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 3 年版』、2021 年 6 月、67 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③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21 年版 総論編 概要』、2021 年 7 月 29 日、11—12 頁、48 頁、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pdf/outline_2021.pdf [2021-08-11]。

其中机电产品同样居首位。^① 这四项产品也体现了日本对外贸易的产业优势所在，分别对应日本强势的汽车、精密仪器、电子器件以及化工原料等产业。由此可见，中日之间的产业结构高度互补，供应链体系深度嵌合。

其三，中日之间长期形成的供应链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2009—2019 年，日本对华出口总额与包含汽车及其配件、部分半导体产品及精密机床在内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大类商品出口额保持了较固定的比值关系，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始终占日本对华出口的一半以上（参见图 1）。而且，长期的产业分工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东盟为生产加工组装中心，日本、韩国提供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中间产品的“四极模式”。^② 其中，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分别主导着区域乃至全球供应链的生产加工和高科技零部件的供给，这种供应网络结构较为稳定，短期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将处于竞争劣势的边际产业和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对外转移，把资本等资源集中用于发展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海外日本企业获得的丰厚利润又可以投资到相关技术研发领域，进一步提升日本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应，^③ 维持技术代际优势。中国是日本对外投资与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利用中国的生产要素优势和地缘便利性，日本在布局其供应链网络进而推动中日间形成稳定供应链体系的同时，其在华企业的高回报收益也可以反哺日本研发技术的资本需求，保持其科技研发的前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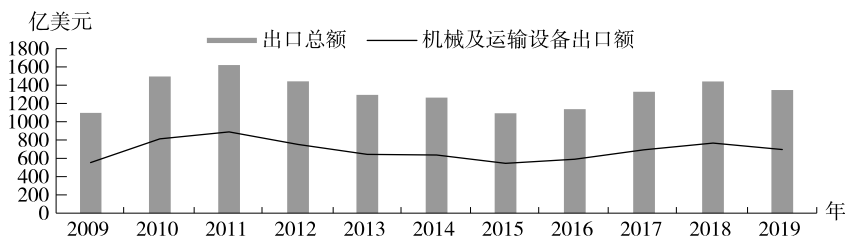


图 1 日本对华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与出口总额的比较 (2009—2019 年)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资料整理，参见：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un.org/data>[2020-09-21]。

① 商务部综合司、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别贸易报告：2019 年日本货物贸易及中日双边贸易概况》，2020 年第 1 期，<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asp?id=11950>[2020-08-20]。

② 张玉来：《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东亚——中日合作的空间与潜力》，《东北亚论坛》2019 年第 3 期，第 48 页。

③ 陈志恒、高婷婷：《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现代日本经济》2020 年第 2 期，第 55 页。

其四，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地位和塑造能力的提升，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压效应”。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规模已接近15万亿美元，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和门类齐全的制造能力，从几乎游离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之外，到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智造”，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使日本从中大为获益，另一方面日本也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对其产生“挤压效应”、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和供应链对其造成不利影响。鉴于此，日本希望借疫情冲击的节点加速调整供应链布局，进而构筑以东盟为核心的多元供应体系，并推进核心产业回归本土生产。

二、疫情背景下日本调整供应链的政策动向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日本经济。根据2021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发达经济体经济萎缩4.6%，其中日本经济萎缩4.8%，美国经济萎缩3.5%，欧元区经济萎缩6.5%。^① 尽管日本为应对疫情出台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与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计划，但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与国内疫情的加重，日本的对外贸易、医疗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供应均出现了一定困难。为此，日本政府确立了提升供应链弹性，摆脱对特定国家的高依存状态，推进供应产地多元化、分散化的供应链重组政策；针对核心科技产业，提升本土化生产水平与补贴力度，支持相关企业回流日本，促进国内就业与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日本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推进建设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重点区域，将医疗卫生、科技产业视为提升本土化生产水平的主要抓手，同时将供应链的过度集中化问题视为巨大的经营风险，积极将对华高度依存的制成品及零部件生产等回迁至日本本土，抑或实施分散化供应。

（一）疫情期间日本推进供应链重组的政策

2020年初，安倍晋三政府出台的第一轮应对疫情的紧急经济政策中，就有专门支持企业应对供应链受损、发放补贴的内容，^② 旨在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设备投资。2020年4月7日，面对疫情的快速蔓延和经济的断崖式衰退，日本政府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紧急经济对策”，表示支持对某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April 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7/27/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uly-2021> [2021-08-07].

^② 《日本设5千亿日元紧急担保额度支援中小企业》，中国贸易投资网，2020年2月14日，<http://www.tradeinvest.cn/information/5255/detail> [2020-04-01]。

一国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商回到日本国内，并鼓励日企向东南亚分散生产基地、谋求产地多元化。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支援供应链重组的专项预算资金，为不同类型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供应链分散到东盟国家或回迁国内提供 1/2 至 3/4 的搬迁费用补助。^① 这是日本政府出台的第一项有关供应链分散回迁的具体政策，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落实。在官方出台有关供应链重组政策的同时，日本产业界也开始审视供应链集中化的经营风险。作为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丰田公司也遭受了“超过雷曼危机时”的冲击，开始重新审视供应网，推进生产和采购的分散化，并探讨利用日本政府的国内生产回归支援政策的可能性。^② 此外，生活必需品与抗疫物资的供应安全也是日本政府关注的重点。在疫情持续蔓延的 2020 年 5 月，经济产业省就着手建立紧急事态时可随时掌握各公司库存状况的系统，通过分析库存量和需求，实行重要战略物资的增产计划或地区间调配。^③ 在安倍晋三宣布辞去首相一职后，菅义伟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为降低供应链集中经营风险，地域集中的生产基地最好要分散，依赖特定国家的供应链也急需调整。^④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迟迟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因担心疫情影响国际供应链，日本在 2020 年 10 月 16 日继续追加 860 亿日元的补贴用于扶持口罩及医药品等生产企业回归国内，其涉及的产品与材料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即可，(1) 生产基地集中在特定国家，(2) 对国民健康至关重要。^⑤

通过梳理日本政府与产业界对供应链重组的政策动向与正式表态，可以发现：其一，疫情是加速推动日本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催化剂。日本政府认为，疫情对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为防止病毒感染扩散而采取的出行限制等强力措施，导致劳动密集型供应链部分出现障碍并引起需求波动，而且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长期影响，供应链管理亟待

① 内閣府「『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緊急経済対策』について」、2020 年 4 月 7 日、30—31 頁、https://www5.cao.go.jp/keizai1/keizaitaisaku/2020/20200407_taisaku.pdf [2020-04-18]。

② 《丰田 2020 年全球销量预计下滑 15%》，日经中文网，2020 年 5 月 13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car/40533-2020-05-13-08-54-13.html> [2020-05-23]。

③ 《日本将建立新系统掌握口罩等生活必需品库存》，日经中文网，2020 年 5 月 29 日，<http://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politicsasociety/40739-2020-05-29-08-37-21.html> [2020-05-31]。

④ 《菅义伟谈供应链》，日经中文网，2020 年 9 月 7 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politicsasociety/41956-2020-09-07-02-09-55.html> [2020-10-03]。

⑤ 《日本追加 860 亿日元生产回归补贴》，日经中文网，2020 年 10 月 16 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economic-policy/42385-2020-10-16-09-20-38.html> [2020-10-23]。

变革。^① 为应对疫情，日本政府早在 2020 年 4 月就曾追加补充预算，设立约 2200 亿日元的专项经费用于支持海外日企回迁，其中针对医药卫生产品、防疫口罩等关乎国民健康的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基地回迁，提供约 2/3—3/4 的搬迁费用补助，明显高于对其他产业、产品供应链转移提供的 1/2—2/3 的补贴力度。^② 可见，一些战略医药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安全与集中依赖问题在疫情期间有所放大，直接影响了日本政府重组供应链的政治决心。

其二，东南亚地区是日本谋求供应链多元化、生产基地分散化的重要支点。立足于采购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应对潜在的供应链集中经营风险，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占据较大优势的东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分散供应链、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首选地，加之地理上的邻近与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日本将在华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也逐渐成为趋势。基于此，日本政府在 2020 年 4 月的补充预算案中，专门设立了规模达 235 亿日元的资金项目，支持以东盟国家为主要供应链调整分散对象的企业。^③ 事实上，包含东南亚地区在内的亚洲长期都是日本实施对外投资、设立海外供应链生产基地的主要聚集地之一，2000—2019 年这 20 年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呈扩大趋势，2019 年达到最高值约 190 万亿日元，其中亚洲的份额一直稳定上升，2012 年以后便基本稳定维持三成以上的占比。具体从与制造业相关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来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亚洲所占比重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即超越了北美和欧洲，2010—2019 年间保持在 35% 到 40% 之间，2018 年达到接近 40% 的峰值；同期，日本对北美、欧洲进行直接投资的占比各 25%—30%。从亚洲地区内部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占比在 2012 年达到顶峰约 14%，其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9 年降至 11.4%；与此同时，日本对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占比却持续稳步升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份额的缩减大多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④

其三，促进重要抗疫医疗产品和战略性科技产业回归日本生产，实行本土化供应战略。日本政府将回迁本土的海外日企分为预防供应链中断、生产

①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3年版』、2021年6月、97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② 経済産業省「令和2年度補正予算の事業概要（PR資料）」、2020年4月、24頁、https://www.meti.go.jp/main/yosan/yosan_fy2020/hosei/pdf/hosei_yosan_pr.pdf [2020-12-26]。

③ 同上。

④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3年版』、2021年6月、76—77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基地地域集中企业与对国民健康、生活至关重要的企业。2020 年 11 月 20 日，经济产业省公布了自 2020 年 5 月以来获得政府政策补助的 146 家海外日企名录，其中医药健康、生活必需品类企业共计 90 家，其余还有 48 家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涉及航空制造、半导体、化学工业、生物医学、新能源、电子通信产品与汽车电池及配件等高技术产业领域。^①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 2020 年 7 月 17 日到 12 月 2 日日本政府针对海外日企供应链多元化支援项目的三次筛选进行了统计：第一次共计 124 家企业提出申请，30 家获批；第二次有 64 件申请案，21 件符合条件；第三次收到 155 件申请案，采纳 30 件；^② 整体通过率不足 1/4。这也反映出海外日企针对疫情期间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有所放大，而日本政府应对供应链政策调整的预算仍显不足。值得一提的是，在获批的 81 家海外日企当中，医疗卫生、防疫设备、电子通信、半导体与汽车零部件厂商占了绝大部分，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有日本半导体企业“罗姆”（ROHM）和液晶面板企业“日本显示器”（JDI）计划将集中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后工序迁回日本国内。^③ 这也反映出数字经济革命与自动化工序进步、运输成本降低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产生了综合效应，促使日本重组相关产业链，推进供应生产的本土化成为可能。

其四，日本的供应链重组计划有着官方与经济界相互协同的特点，不仅是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疫情冲击的供应链调整政策，经济界和海外日企对此也大多持支持态度。疫情期间，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和《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对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回归本土的政策表示赞成的受访日本商务人士达到近六成，超过四成的受访者称“未来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重要性将会降低”。^④ 2021 年 3 月 12—29 日《日本经济新闻》组织的“百名社长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在日本国内拥有工厂的企业中，有

① 経済産業省「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対策のための国内投資促進事業費補助金」、2020 年 11 月 20 日、<https://www.meti.go.jp/information/publicoffer/saitaku/2020/downloadfiles/s201120001.pdf> [2020 - 12 - 26]。

② 参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第一回公募」、<https://www.jetro.go.jp/services/supplychain/kekka-1.html> [2020 - 12 - 26]；「第二回公募」、<https://www.jetro.go.jp/services/supplychain/kekka-2.html> [2020 - 12 - 26]；「第三回公募」、<https://www.jetro.go.jp/services/supplychain/kekka-3.html> [2020 - 12 - 26]。

③ 《日本电子零部件制造工序出现回归动向》，日经中文网，2020 年 6 月 16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40856-2020-06-16-05-00-00.html> [2020 - 06 - 19]。

④ 《调查显示日本商务人士对中国很纠结》，日经中文网，2020 年 9 月 4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41940-2020-09-04-01-54-53.html> [2020 - 09 - 06]。

八成已着手调整供应链，目的是弱化供应链的脆弱性与集中化问题。^① 简言之，面对疫情冲击、中美竞争加剧以及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压力，部分日本企业受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驱动，将供应链迁出中国也是其重要选项之一。

（二）疫情背景下日本在华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趋向

对日本而言，选择构建以东南亚为重点的多元化供应链网络，改变部分产业对中国供应链网络的高度依赖，助力核心科技产业与关键生活必需品物资的生产基地回归本土，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政策取向。具体而言，日本供应链重组政策的核心就是调整在华供应链，无论是重点产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分散化，抑或是核心科技与医药卫生产业的重新布局，其针对的所谓“特定国家”就是中国。日本政府担心其生产供应链过度集中到中国会产生过激风险，希冀以泰国、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为基点，推进“中国+1”的供应链分散战略。该决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于：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汇率上升等因素，部分产业在华份额已经达到极限，引发纺织等轻工业及一些机械制造行业（轴承等）已经开始搬迁，而泰国、越南、印尼等国的份额正在增加，可以助力日本相关产业的生产基地和采购供应的多元分散；同时，中美战略博弈可能会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② 鉴于此，推进在华供应链调整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构筑更加多元分散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能促进日本国内就业、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

受疫情影响，202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1711亿美元，比2019年减少33.8%，其中对华直接投资约113亿美元，同比下降约7.5%。进入2021年，1月到5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仅约40亿美元，同比下降30.6%；与之相比，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高达约167亿美元，增长幅度为83.4%，日本对外投资重点转向东盟的趋势日趋显著。^③ 具体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疫情防控与关键医疗设备供应商以及高端制造业和重要科技公司等三类在华企业重塑与调整供应链网络，将成为今后日本构筑多元分散的供应链安全体系的主要落脚点。不仅如此，后疫情时代日本在华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可以用

^① 《8成日本企业着手调整供应链》，日经中文网，2021年4月6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44310-2021-04-06-05-00-00.html> [2021-05-05]。

^②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3年版』、2021年6月、85—86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③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21年版 総論編 概要」、2021年7月29日、24頁、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pdf/outline_2021.pdf [2021-08-11]。

“疫情驱动”“产业主导”与“价值取向”三个关键词加以概括，这如实反映了日本供应链调整政策的目的所在。

第一，疫情背景下日本重塑在华供应链的政策，呈现出核心环节本土化、供应链条短缩化、分散地域集中化等主要特点。

日本政府对于海外日企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尤其是在华生产基地集中化的担忧由来已久，疫情一定程度上阻断了部分产业的供应链畅通，也给了日本政府重新布局海外关键产业、推动供应链网络多元分散的契机。显然，疫情驱动是影响日本重塑在华供应链的重要动因之一。疫情暴发初期，安倍政府就着手制定应对供应链受损的相关援助政策，多次提及改变供应链集中在特定国家和布局关键产业的生产基地多元化的重要性。菅义伟政府继承了这一供应链调整路线的政策思路，并将之具体落实。

当然，日本供应链调整政策不仅受到疫情冲击以及经济成本考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日本试图借助疫情调整在华供应链网络，构建分散化、多元化的供应体系格局，推动核心产业回流本土，促进数字技术、新能源等前沿科技产业的供应安全，化解疫情带来的“被动”，并将之转为“主动”，在“危机”中寻求“机遇”，重新确立日本海外供应链网络的“安全自主”。即，除了受市场竞争原则与生产要素变化影响外，日本更多考虑的是着眼于维护自身重要供应链网络的自主性、多元性以及核心产业供应的本土化，提前布局新工业革命前沿领域的供应链安全。

从这一角度出发，日本在华供应链调整政策可以归纳为核心环节本土化、供应链条短缩化与分散地域集中化等三大特点。其一，将在华重点产业供应链的核心环节进行本土化生产，提高对关键产业供应链体系的自主掌控能力；其二，改变长供应链条的集中化趋势，拆分重要产业的供应链条，将供应链条短缩分散化；其三，将集中在中国的供应链分散迁移到同样具有地缘便利性且部分生产要素更具竞争优势的东南亚地区。这三大特点相互关联、互为依托，主要针对长供应链、重要产业供应链在华的地缘集中性以及供应链核心环节的安全性等进行政策引导。

第二，顺应疫情背景下“提质升级”“优化结构”的产业政策调整。

所谓“产业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贸易保护或政府采购等手段影响和塑造经济结构的专门措施，主要表现为有利于特定产业或经济部门的部门性政策，也可以表现为有利于特定企业的政策。其理论依据是，整体经济运行体系中存在某些产业部门比其他部门更为重要，可以为经济循环提供

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他正向外部效应，且拥有较高的附加值。^① 一国的产业政策是影响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要素，无论是制度经济学强调社会制度、政府政策对于市场运行发挥巨大作用，抑或是经济贸易理论中限制贸易、主张政府干预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和“国家安全论”，^② 都较为细致地论证了产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这是获得了学界公认的。在日本推动在华供应链调整的过程中，产业政策无疑也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供应链的调整和生产基地的空间分布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面对经济危机时，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政策工具中的关键支撑点。从 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数据来看，贸易总额约为 17.2 万亿美元，比 2019 年下降 7.0%，但是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相关产品的贸易额却不降反升，比如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 14.6%，集成电路增长了 12.6%，锂电池增长了 28.4%，电动汽车增长了 45.9%，均显示出新的产业机遇与经济增长点。^③ 不仅如此，疫情背景下，各国政府均扩大了经济干预的力度和广度，受其影响，日本政府也认识到，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产业进行财政补贴和产业扶持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还可借助疫情“东风”，加速推进全社会的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 日本政府希冀在疫情中寻求变革机遇，加大对前沿科技领域的投入，尤其是聚焦绿色环保与数字技术等重点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保障上述重点产业的供应链安全。

日本政府极为重视数字技术、绿色环保和新一代通信技术等相关产业的供应链安全。在 2020 年 4 月 7 日日本内阁通过的紧急经济政策中，就有专门鼓励海外新能源企业回迁日本、支持本土 5G 基础设施通信产业发展的内容。^⑤ 2020 年 7 月经济产业省发布的《通商白皮书》也提到，政府支持重要行业如汽车、电气和电子设备、高性能材料等建立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同时要加

①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39—140 页。

② N. 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七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99—200 页。

③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21 年版』、2021 年 7 月 29 日、11 頁、14 頁、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2021/no1.pdf [2021-08-11]。

④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 3 年版』、2021 年 6 月、18—20 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⑤ 内閣府「『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緊急経済対策』について」、2020 年 4 月 7 日、31 頁、43 頁、https://www5.cao.go.jp/keizai/keizaitaisaku/2020/20200407_taisaku.pdf [2020-04-18]。

加大对包含敏感技术、新兴技术在内的供应链项目的安全审查力度，与盟国合作构筑国内经济的安全体系。^① 2020 年 12 月 4 日，菅义伟首相再次强调，遏制新冠肺炎疫情、重建经济是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为达成“去碳化社会”与“数字化社会”的愿景，日本政府将设立 2 万亿日元的“环境基金”，并在数字领域投入超过 1 万亿日元经费，支持相关企业对前沿数字、绿色技术的研发应用。^② 实际上，日本在碳中和技术及部分数字产业等领域都有存量优势和技术积淀，以绿色技术相关专利为例，2015—2017 年的三年间，日本关于减排技术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居世界首位，电动汽车及电池相关产业的技术专利优势尤为突出。^③ 由此也不难理解东芝、富士电机等企业近期计划立足日本国内，建立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供应链体系，以及加大对面向未来数字技术、与新能源汽车息息相关的半导体领域的相关投资，以确保供应链安全。^④

第三，选择与美国等“价值观同盟国”在供应链调整问题上深度合作。

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美国对华单方面“硬脱钩”尤其是科技领域“脱钩”，导致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可能强行分离双方既有的经贸关系和供应链体系，进而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生产供应链。受其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已成定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脱钩”既有为了打压对手，保持在全球供应网络体系中的技术优势、层级地位的“主动型脱钩”，也有为了规避“脱钩”、事实上却加快了“脱钩进程”的“被动型脱钩”，“主观”与“客观”力量交织，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改变将围绕着中美两国展开。^⑤ 而且，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政策已经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普遍共识，即使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也难改观，仍奉行对华科技“脱钩”以及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既定路线。^⑥ 以此为背景，在全球经贸和生产供应链结构中仅次于中美经

①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 2 年版』、2020 年 7 月、307 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0/pdf/2020_zentai.pdf[2020-12-26]。

② 姜俏梅：《日本首相：遏制疫情、重建经济是首要任务》，新华网，2020 年 12 月 5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12/05/c_1126823654.htm[2021-01-03]。

③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 3 年版』、2021 年 6 月、174 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2021-08-08]。

④ 《日企相继增产电动汽车用功率半导体》，日经中文网，2020 年 12 月 21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manufacturing/43138-2020-12-21-05-00-00.html>[2021-01-03]。

⑤ 张宇燕等：《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4 期，第 6 页。

⑥ 《聚焦：日本期待拜登政府回归国际协调路线》，共同网，2020 年 11 月 9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11/9c58029d5ad6.html>[2020-11-10]。

贸关系的中日经贸关系将成为重要课题。中美经贸科技领域“脱钩”会影响日本的供应链重塑战略，也可能促使日本加大对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限制措施。

事实上，日本政府对于供应链调整的国际合作已经做出了“价值判断”，确定了与所谓友好国家一起构筑“价值观同盟供应链”的决策姿态。2021年5月24日，经济产业省提出了对涉及经济安全保障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意见，其中围绕供应链问题表示日本应与美国等友好国家一同协调推进；在针对与中国开展供应链合作的问题上，日本强调要在相关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考量，主要限定为非敏感产业领域的合作。^① 2021年6月，经济产业省发布2021年版《通商白皮书》，其中也提到，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对环境和人权等“共同价值观”的关注正在迅速增加，日本有必要顺应这一趋势。^② 显然，后疫情时代的日本供应链政策调整，其国际合作对象被限定为美国、欧洲国家以及印度等所谓“民主同盟”或“共享价值观”的友好国家，在日本看来，中国不但不属于该行列，更是日本着手进行供应链调整国际合作的主要针对对象。2020年12月，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组织的会议就建议，要着眼于后疫情时代和共同价值观国家合作主导新国际秩序，并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③ 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已在一些关键的科技产业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等产业上追随美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与贸易投资施加歧视性政策条款，同时酝酿限制在日中国留学生对敏感技术的学习等。^④ 日本对于供应链网络过度依赖中国早有忧虑，疫情加速了日本对在华供应链网络的调整；加之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日本已决心向美国靠拢，在构筑面向未来前沿产业的相关供应链问题上，其“价值取向”日渐清晰，即更多地选择与美国等“价值观同盟国”携手合作，企图共同协调对华核心产业的供应链调整策略。

① 《日本经济省：应与友好国家构建供应链》，日经中文网，2021年5月25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economic-policy/44843-2021-05-25-01-34-56.html> [2021-06-09]。

②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3年版』、2021年6月、184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③ 自民党「提言『経済安全保障戦略策定』に向けて」、2020年12月22日、<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1021.html> [2021-08-11]。

④ 「留学生ビザの審査厳格化へ…中国念頭、安保技術を流出防止」、『読売新聞』2020年10月5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01005-OYT1T50013> [2020-12-25]。

三、日本驱动供应链重塑的动因

日本立足于提升供应链弹性与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供应链调整战略，主要受到了疫情冲击、技术民族主义驱动与美国因素三者叠加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中具有完整性和可塑性的优势，日本则要努力维护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层级既定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言，选择对华在特定高端科技领域的供应链“脱钩”政策，符合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优化海外日企供应基地的多元布局，降低相关产业在海外经营的成本，也是日本政府实施供应链调整政策的目的之一。实际上，2019 年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为 23.4%，若以进军海外的日企为基准，则其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已达 37.2%。^① 海外子公司开展销售活动并获得利润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重要推动力，贴近供应需求市场、“地产地销”策略成为日本海外企业的主要经营手段和关键战略措施。^② 但受疫情冲击，日本政府认为必须加速改变海外日企供应网络与生产基地集中于某一特定国家的经营风险。

（一）基于市场原则的收益—成本考量

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和跻身世界制造业大国的重要节点性事件。与此同时，多年来中国持续致力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之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价格及税收政策优势等，使得跨国公司纷纷投资中国布局供应链，并获得通常远高于多数国家的投资回报率。跨国资本和海外企业纷纷在华投资建厂，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实力的提升和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核心地位的形成。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快速上升，中国的相对成本优势发生变化，对海外资本、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同时，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中国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均对日企在华供应链投资布局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 2021 年 7 月公布的《第 50 次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概要》的统计结果显示：2015—2019 年间，日本海外企

① 经济产业省「第 50 回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概要」、2021 年 7 月 30 日、12 页、<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7/20210730011/20210730011-1.pdf>[2021-08-11]。

② 张玉来：《日本制造业新特征及其转型之痛》，《现代日本经济》2018 年第 4 期，第 39—40 页。

业地域变动幅度最大的就是中国市场，每年约有 220 至 280 家在华日企撤出，远超东盟、北美、欧洲等地域各 80 至 120 家的撤离水平，而且，在华日企的撤退比例（2.8%—3.5%）也是四个地域中最高的。^① 后疫情时代，中国作为第一个摆脱疫情严重冲击的主要经济体，仍将受到日本海外投资企业的青睐和重视，但劳动力、土地及物价的长期上涨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日企在华投资动力，引发日企更多地选择向劳动力、土地价格更加低廉的东南亚等地区进行布局，加速劳动密集型和低端高能耗产业的外迁。2020 年 10 月 18 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上任刚满一个月，就打破新任首相首访选择美国的惯例，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展开了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将越南、印尼这两个东南亚国家作为首访目的地，有强化与东盟国家关系、助力本国经济复苏等多重考虑。^② 不能忽视的是，近年来越南、印尼等国经济发展迅速，是国际金融机构极为看好的新兴经济体，其劳动力成本、土地租金、原材料价格相对较低，对日本而言，将一些在华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产业转移到这些东南亚国家，是生产采购分散化、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疫情防控与关键医疗防护设备供应的本土化考量

疫情期间，中国强大的医疗防护产品制造实力为全球抗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也引发了一些国家对关键医疗防护设备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在日本医用口罩进口中，中国产口罩所占比例一度达到 96%，^③ 重要医药抗疫物资采购过度集中于中国，引发了日本对其供应安全的极大忧虑。2020 年 12 月 21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更新了 4 月 13 日出台的支持海外日企供应链多元化尤其是保障医药产业供应安全的政策文件，继续加大对相关企业的补助力度。^④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和日本国内疫情日趋严重，日本决心加强医疗卫生等关键物资产品供应的多元化、本土化。日本政府为减少关键医疗设备对华依赖，将和约 400 家企业合作，推进医疗用品的国产化。^⑤

① 経済産業省「第 50 回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概要」、2021 年 7 月 30 日、9 頁、<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7/20210730011/20210730011-1.pdf>[2021-08-11]。

② 《菅义伟首访为何选择越南和印尼》，新华网，2020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0/18/c_1126626212.htm[2020-10-26]。

③ 《全球医用防护用品对中国依赖增至 8 成》，日经中文网，2020 年 8 月 25 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investtrade/41780-2020-08-25-04-30-00.html>[2020-08-29]。

④ 経済産業省「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で影響を受ける事業者の皆様へ」、2020 年 12 月 21 日、38—39 頁、<https://www.meti.go.jp/covid-19/pdf/pamphlet.pdf>[2020-12-25]。

⑤ 《日本医疗用品海外依存度高，推进国产》，日经中文网，2020 年 5 月 13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40521-2020-05-13-04-54-22.html>[2020-05-23]。

需要指出的是,生物医药和疫苗研发是日本传统的优势产业,但疫情的大规模扩散和新冠病毒的传播特性使得日本在个人防护设备上严重依赖在防控疫情中积累了足够经验、建立了充沛产能的中国。个人防护设备(如口罩、防护服等)的制造并不困难,且附加值有限,日本构筑相关医疗防护设备的国产化并非难事,其更多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市场竞争原则、收益—成本最优策略和本土化战略三者中求得平衡。抗疫防护设备的本土化生产措施,更多是考虑应对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临时性举措,以及解决相关物资集中采购带来的风险。

(三) 科技战略竞争与借助疫情加速布局新工业革命的前瞻性产业

技术创新是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及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也是各个国家和政府都极为关注本国的技术实力、极力防止本国最重要技术流失的主要动能,由此便形成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本源。各国为了取得技术优势而展开的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一大特征。^① 每逢遭遇全球性的国际大危机,科技发展总是推动一国走出经济泥潭、抢占世界格局变革制高点的关键。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德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力推“高端制造业”回归战略和“工业制造 4.0”发展宏图就是例证,对日本而言,其目的就是要重振经济和抢占新科技革命机遇的“先手棋”。^②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体系格局、全球经贸分工结构的冲击甚至大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安全。在新工业革命机遇呼之欲出的背景下,以贸易、科技立国的日本,对中美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初创独角兽企业的崛起有所担忧,也不愿自甘落后,寄希望于借助疫情推进相关供应链重塑与关键产业本土化,包括云服务、电子商务、治疗药物和疫苗等“新冠科技”。^③ 近期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美国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 5G 等领域取得进展保持警惕,并施加了一系列贸易禁令与制裁措施。日本选择紧跟美国,事实上排除了在全球通信服务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华为公司在日本 5G 市场中参与公平竞争资格,同时加速研发日本的 5G 甚至 6G 技术,意图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主导权。

①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第 98—99 页。

② 王庭东:《东亚产业链重构影响因素辨析: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经济学家》2013 年第 7 期,第 87—88 页。

③ 《疫情催生中美科技独角兽企业》,日经中文网,2020 年 7 月 22 日, <https://cn.nikkei.com/china/ccompany/41369-2020-07-22-05-00-01.html>[2020-07-27]。

2020年6月29日,日本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强调政府将支援企业的技术开发,推动研发5G移动通信系统。经济产业省也宣布,将对国内电机厂商和通信公司等提供规模达7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的资金支持。^①日本对5G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在着手推进5G技术的商用化、国产化的基础上,更瞄准了新一代的6G网络通信标准与技术研发。总务省在2020年4月8日发布了“至2025年日本国内确立6G主要技术”的战略目标,以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信息通信研究机构”为中心,成立产官学合作的新组织,计划到21世纪30年代实现6G技术的市场推广。^②不仅如此,在英国因中国香港问题迁怒华为并将其排除在5G设备供应商名单之外以后,日英两国在5G领域的合作也有所加强。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希望日本在5G通信网络建设方面提供协助,由此,日本通信技术巨头日本电气公司(NEC)和富士通公司取代华为,成为向英国提供技术服务支持的重要潜在供应企业。^③总之,受疫情冲击和相关国际事件的推动,日本加快了构建5G乃至6G标准的战略,提前谋划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此外,以量子技术、芯片半导体、新一代通信技术以及3D打印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优势产业,酝酿着新的发展机遇,也是大国竞相抢占科技发展前沿制高点的核心领域。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曾指出:“随着时间推移,经济收益分配的不平等必将改变国际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均势,从而影响国家安全。因此,国家对于国际经济对相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总是十分敏感,特别是对各国实力地位至关重要的高科技工业的实力分配十分敏感,而工业和技术能力的地理分布对每个国家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④以科技立国并始终将先进技术视为立国之本、经济根基的日本,对新科技革命、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保持着高度敏感性,一些领域的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促进新工业革命前瞻性产业的发展与供应安全,将是日本重塑供应链、促进相关产业和核心技术供应链网络本土化的重要动力。日本政府认为,后疫情时代,数字化与绿色化产业将成

① 《日官房长官称要官民携手开发下一代通信技术》,共同网,2020年6月30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06/8db24fe49c1f.html> [2020-07-01]。

② 《日本发布战略目标:2025年确立6G技术》,日经中文网,2020年4月9日, <https://cn.nikkei.com/industry/science/technology/40128-2020-04-09-11-29-05.html> [2020-04-12]。

③ 《英国向日本提出5G领域协助希望》,日经中文网,2020年7月20日, <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41343-2020-07-20-08-44-23.html> [2020-07-27]。

④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第72页。

为投资潮流，日本必须把握机遇，支持数字与绿色等相关产业发展，加强和东盟、印度、欧美等的初创公司合作。^①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支持三类在华日企迁出，即劳动密集型企业、疫情防控设备生产企业以及高端制造业和重要科技企业。其中，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主要受到成本—收益的市场竞争原则驱动，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些企业的离开，对于中国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供应链升级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关疫情防控设备供应商的本土化生产策略，更多是日本政府针对当前疫情肆虐的一种补救措施；而且，个人防护设备制造工序较为简单、原料易于获取、利润空间有限，故日本推进个人医疗防护设备的国产化没有大的障碍。真正会对中国供应链安全构成较大危机的是日本高端制造业和重要科技企业的撤离，这一类企业不仅产品附加值高、科技水平先进，而且是数字经济与新工业革命的“头部企业”，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更新迭代。因此，对中国而言，前两类企业的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与供应链体系影响有限，但在华高端制造业和重要科技日企生产基地回流需要重点关注。

（四）国内保守势力和美国因素

近十年来，中日政治关系波折起伏，2017 年之前中日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政冷经凉”的尴尬状态，究其原因绕不开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倾向和对美“跟随外交”。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却难以在心理上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在“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之间选择了后者，进而挑起历史、领土等问题，恶化两国关系，在政治右倾化道路上愈走愈远，对华“脱钩”、撤离在华日企也成为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重要政策主张。安倍首相在其执政后期主动缓和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有所回暖。疫情初期，日本对华援助也进一步拉近了中日两国民众的距离。2020 年 8 月 28 日，创下日本战后首相任期最长纪录的安倍晋三突然宣布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将辞去首相之职的决定，^②这对中日关系的走势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随后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南海等问题上的相关表态，以及部分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倒行逆施、不加反省的恶劣行径，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①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2021 年版 総論編 概要」、2021 年 7 月 29 日、53 頁、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pdf/outline_2021.pdf[2021-08-11]。

② 《安倍突然宣布辞职冲击日本政坛》，新华网，2020 年 8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8/28/c_1126425599.htm[2020-08-29]。

日本对美一贯奉行“跟随外交”，始终坚持日美同盟处于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基石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尖端企业、核心技术以及高附加值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垄断。^①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经贸摩擦的领域和程度不断扩大。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减少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削弱了其国际地位，而且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增长可能使美国国家安全相对衰落到令人担忧的地步。这一趋势也反映在美国对华整体感知上，2021年3月4日皮尤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8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而非合作伙伴；48%的美国人认为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事项，远高于2018年的32%。^② 美国对华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战略，不仅意在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完整性与全球性、可塑性，更深层次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原有供应链网络的层级性，阻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地位与关键程度的提升进而威胁其技术霸权垄断地位。在此背景下，新任总统拜登重拾“多边机制”，将日韩等同盟国视为“力量倍增器”，寄希望于倚靠其亚太联盟网络共同应对所谓“中国挑战”。^③ 新冠肺炎疫情已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的完整性与全球性，近年来的逆全球化浪潮与贸易保护主义也使得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遇挫，加之美国的经济单边主义以及对华“硬脱钩”政策，全球供应链体系面临“两极化、分散化”的风险。

经济上与中国有紧密联系，安全防务关系上又与美国不可分割，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之间的回旋余地愈发狭小。长期以来，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安全基石”，这一军事同盟框架也会影响中日之间正常的经贸联系。随着美国拜登政府的政策转向，日本对于日美关系的改善以及拜登政府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持积极态度。^④ 以此为基点，构筑区域内多

^① 李盛竹：《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战略研究——基于新“政治—技术霸权”背景》，《国际经贸探索》2010年第7期，第50页。

^②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Most Americans Support Tough Stance Toward China on Human Rights, Economic Issues”,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4,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1/03/PG_2021.03.04_US-Views-on-China_FINAL.pdf [2021-07-17].

^③ Antony J. Blinken and Lloyd J. Austin III, “America’s Partnerships Are ‘Force Multipliers’ in the World”,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3/14/americas-partnerships-are-force-multipliers-world/> [2021-03-16].

^④ 《聚焦：日专家认为美中对立难消影响日本经济》，共同网，2020年11月1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11/f768561b90e5-.html> [2020-11-20].

元供应链体系的政策也呼之欲出。在美国影响下，日本政府进一步调整在华供应链，为两国正常的经贸来往、技术引进乃至人员来往设置行政障碍的可能性大增。例如，日本 2021 年版《通商白皮书》中就表示：要努力加强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针对中美争夺技术霸权和疫情传播导致的供应链脆弱性问题，为确保日本经济安全，支持海外生产基地高度集中的重要商品的多元化生产，与盟国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全球供应链，并促进重要生产基地的本土化，确保先进技术的研发优势。^① 由是观之，政治保守因素和美国的压力以及技术民族主义的泛滥影响了日本对华经济战略，加速其推进多元化供应链战略，供应网络迁移分散到东南亚地区以及促进核心产业回流本土等，甚至可能增加其对华科技产业实施“限定性脱钩”、主动设置合作交流障碍的风险。

四、日本驱动供应链重塑的特征

日本政府认为，在数字技术、尖端材料、先进电子元器件等领域的供应链问题上，国家安全与价值观判断应重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与中国在相关产业上的竞争将成为主流。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在华先进制造业和重点领域的日企将生产基地回迁日本本土或分散布局到东南亚等地区，就是一大例证。后疫情时代，供应链的安全性问题是日本政府进行供应链政策调整的主要立足点，政策重心是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体系。“自主可控”体现在日本政府大力鼓励与尖端技术优势培育、产业提质升级、国民基本生产生活物资保障等息息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回归，重构日本的产业优势地位和技术创新能力；“安全可靠”则主要表现在日本加紧与美欧印等所谓“价值观同盟国”在供应链尤其是半导体、稀土等尖端技术与战略资源上进行合作，以保障供应链安全和多元化供应。对日美等国而言，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同时集合了超大规模、全体系的工业制造业供应能力以及中长期经济发展潜力等诸多要素，使得中国存在掌控和主导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可能性，并在尖端技术和高端产业上对其产生“挤出效应”，威胁其国际经济地位和技术根基，这是日美等国所担忧和不能容忍的。

^①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3年版』、2021年6月、185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2021-08-08]。

（一）聚焦数字技术、绿色环保等前沿领域的供应链安全

“绿色”和“数字”是菅义伟政府经济政策的两大关键词，被视为促进日本经济社会结构性转型的立足点，也是构建“菅经济学”体系的灵魂所在。^①菅政府十分注重保护日本尖端技术尤其是事关数字经济基础的信息产业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和5G通信技术的供应链安全。2020年12月10日，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基础设施系统海外部署战略2025》就提出：要利用日本具有优势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进行海外推广，如5G基础设施和海底光缆等，同时也要确保可靠的供应链来源和核心技术不能流失，持续推进占据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酷日本”战略。^②在2020年底，日本政府出台“绿色增长战略”，重点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经济产业省更是新设了2000亿日元规模的产业基金，主要用于“支援新一代半导体技术开发”和引进世界顶尖研发制造企业入驻日本，同时专设420亿日元资金用于扶持相关日企开发2纳米级半导体芯片及其生产技术。^③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台积电公司已宣布在日本筑波科技城设立研究开发据点，并与信越化学、日东电工、日立及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日本知名企业与科研单位协同合作，一道开发尖端半导体后工程所需的先进工艺及相关技术。^④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早已计划最早在2021年6月敲定促进国内尖端半导体和蓄电池生产的经济成长战略，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同时，强调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吸引有实力的美国企业对日投资设厂，通过日美合作强化关键前沿科技领域的供应链安全。^⑤2021年6月4日，经济产业省宣布，已确立了以扩大国内生产能力为目标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根据这一战略，日本将加强与外国合作，联合开发尖端半导体制造技术并确保生产能力，促进绿色创新，其重点是优化国内半导体产业布局、加强产业韧性。^⑥在相关政策的有

① 陈友骏：《日本“菅经济学”的特色与困境》，《环球时报》2021年1月21日。

② 首相官邸『インフラシステム海外展開戦略2025』、2020年12月10日、19—20頁、<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49/siryou2.pdf>[2021-03-10]。

③ 苏海河：《日本芯片产业试图再续辉煌》，《中国贸易报》2021年4月20日，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epaper/content/2021-04/20/content_72030.htm[2021-05-06]。

④ 経済産業省「【参考】先端半導体製造（後工程）プロセス技術の開発採択テーマ概要（1）」、2021年5月、<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5/20210531002/20210531002-2.pdf>[2021-06-10]。

⑤ 《日本制定战略促进自身半导体生产》，日经中文网，2021年5月19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economic-policy/44779-2021-05-19-09-03-43.html>[2021-06-04]。

⑥ 刘春燕：《日本宣布确立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新华网，2021年6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06/04/c_1127530985.htm[2021-06-09]。

力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日本电子零部件厂商开始把产品的生产放到多个基地或者回迁本土。东京电气化学工业（TDK）株式会社旗下子公司“TDK - Lambda”针对此前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生产的约 100 种电源零部件，已开始在新潟县长冈市的基地进行生产，并建立了涵盖近 4000 种产品的分散化生产体制。^① 在日本政府看来，数字技术和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的日本技术优势及供应安全，关乎日本未来国家发展前途和国际经济竞争力，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相关问题。日本政府已从产业政策的高度，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半导体、蓄电池等与数字技术和新能源产业紧密相关的核心产品的供应链安全政策，希冀在相关领域打造技术顶尖、工艺先进的本土化供应链网络。

（二）建立多层次、宽领域的“价值观同盟国”供应链体系

与此同时，日本试图建立以“日美协调”为轴心、日美印澳“四边机制”（QUAD）与七国集团（G7）为骨干、日本—东盟为重点的多层次、宽领域的“价值观同盟国”供应链体系。实际上，日本酝酿建立“供应链联盟”的构想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就已显露，包括出台大量政府报告以及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发表有关安全可靠的供应链联合声明等。2020 年 9 月 1 日，日印澳三国签订的《日印澳经济部长关于供应链弹性的联合声明》就提到在应对疫情危机背景下，日印澳将加强包括数字技术发展在内的必要合作，提升印太地区的供应链弹性。^② 进入 2021 年，日本进一步加大了推动构建以“日美协调”为轴心的“共享价值观”供应链联盟体系的力度。3 月 12 日，日美印澳四国首脑举行线上磋商会谈，确认了分散供应链的必要性，并建议四国在确保稀土方面展开合作，共享生产技术和开发资金，联手制定国际规则。^③ 不仅如此，四国还将成立高级别疫苗专家组、气候问题工作组和关键与新兴科技工作组。^④ 由此，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不断深化拓展，并向着经济技术层面的“四边供应链联盟”趋势发展。2021 年 4 月 16 日，在菅

① 《日本电子零部件厂商推进分散生产》，日经中文网，2021 年 5 月 20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44777-2021-05-20-05-00-00.html>[2021-06-08]。

②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Australia - India - Japan Economic Ministers’ Joint Statement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eptember 1, 2020,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9/20200901008/20200901008-1.pdf>[2021-02-03]。

③ 《日美澳印将为确保稀土展开合作》，日经中文网，2021 年 3 月 12 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commodity/44070-2021-03-12-09-47-35.html>[2021-03-15]。

④ 刘品然：《美日澳印领导人讨论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新华网，2021 年 3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3/13/c_1127205665.htm[2021-03-15]。

义伟与拜登首次会谈后，双方即公布了《日美首脑共同声明》及相关文件，其中就指出日美将在推进安全开放的 5G 网络、共同投资开发 6G 网络及尖端 ICT、建立日美全球数字伙伴关系、制定国际数字标准、开展半导体及关键数字技术在内的供应链合作等五个方面，协调双边行动并具体落实。^① 5 月 3 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 G7 外长会议开幕前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提出鉴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日美今后有必要在“共享价值观”的各国构筑起供应链。^② 日本在日美首脑会谈、四国首脑会议以及 G7 外长会议上的相关表态显露出，日本已决心在通信技术、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向美国靠拢，通过“日美协调”“四边机制”以及与 G7、东盟成员国等加强协作，建立多层次、宽领域的“共享价值观”的供应链联盟，以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

长期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存在经济领域的“贸易立国”和安保层面的“日美同盟”两条路线。日本当前一系列对外政策调整正在经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两条路线间的界限日渐消弭、相互交融，加速向着“日美协调”的综合性经济安保战略的趋向发展。在经济贸易、战略政策和科技竞争等多个维度，都显现出“日美同盟”的优先性。^③ 疫情背景下，日美等国进一步加大了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仅如此，日本还将 QUAD、G7 等多边机制视为建立数字、绿色等重点产业多边供应链联盟的重要平台，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美近期在有关前沿技术、创新能力等议题上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相关供应链调整战略也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日本而言，“美主日从”的非对称性同盟框架和中美竞争趋向长期化等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意味着日本政府的内政外交都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难以在中美之间维持微妙平衡，只能在安全领域愈发向美国靠拢。^④ 不仅是安全领域，面向后疫情时代，日本已制定了与美国等国家联手推进有关尖端技术与关键领域供应链

① 首相官邸「日米競争力・強靱性（コア）パートナーシップ」（日米首脳共同声明別添文書 2）、2021 年 4 月 16 日、1 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25.pdf> [2021-05-10]。

② 《日美外长伦敦会谈重申携手应对涉华涉朝问题》，日本广播协会网，2021 年 5 月 4 日，<https://www3.nhk.or.jp/nhkworld/zh/news/297743/> [2021-05-06]。

③ 陈友骏、赵磊、王星澳：《日本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华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6 期，第 26 页。

④ 蔡亮：《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日本学刊》2021 年第 2 期，第 21 页。

安全合作的政策，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平衡中国科技能力跃升所带来的冲击。美国拜登政府正在积极落实并维护供应链体系安全、支持核心产业回流美国本土，同时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提升尖端产品的供应链“国产化”水平。2021 年 2 月底，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 100 天内对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药品和稀土等重要矿物四个领域的供应网络进行审查。6 月 8 日，美国总结了有关审查采购半导体等战略物资供应链的具体战略，提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明确要求与 QUAD 和 G7 等成员国加强合作，制定以可靠供应为目标的政策，强调重要零部件的国内生产重建和采购来源多元化。^① 由此可见，美国供应链调整战略与日本的弹性供应链政策不谋而合。不难想象，后疫情时代，日本将着眼于建立核心产业“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体系，加速与美国等“价值观同盟国”结成供应链联盟，寻求提升日本对关键产品及技术的供应链掌控能力，确保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与技术优势地位。

五、中日供应链合作的可能性前景

2020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到“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提出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立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8 月 24 日，他再次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双循环”的主线和关键点，要立足于构筑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② “双循环”理念是疫情危机下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发生停摆危机与国际格局变化的重大经济战略调整，也顺应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跃升的大趋势，着眼于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规模优势和产业结构提质升级愈加凸显的态势。不仅如此，疫情期间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供应链调整的政策，集中体现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020 年 10 月 26—29 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 2020 年 12 月 18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三次重要的工作会议及其报告所传达的指示

① 鳳山大成「米戦略物資、クアッドで安定調達 半導体など中国対抗」、『日本経済新聞』2021 年 6 月 9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GN07D7D0X00C21A6000000/\[2021-06-12\]](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GN07D7D0X00C21A6000000/[2021-06-12])。

② 《习近平总书记谈新发展格局》，求是网，2021 年 1 月 26 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tiqu/2021-01/26/c_1127025862.htm\[2021-05-01\]](http://www.qstheory.cn/zhuantiqu/2021-01/26/c_1127025862.htm[2021-05-01])。

与措施，主要涉及保障供应链体系通畅稳定、优化供应链结构层次和提升制造业水平以及确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等内容。^① 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再次强调：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加快完善相关商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② 由此可见，中国对供应链安全高度关注，尤为重视中国在受制于人的相关尖端技术与基础研发方面实现突破。一言以蔽之，后疫情时代，中国供应链调整政策的核心是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前沿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将建立全方位、综合性、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视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人民生活福祉的重要战略目标加以推进，不断提升供应链体系的自主可控水平，布局尖端科技和高端产业的供应链安全。新的历史时期，助力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的提质升级与核心产业的供应安全，将是中国相关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将对中日未来在供应链相关领域的合作产生深远的塑造作用。

（一）“有限合作型”的中日供应链合作模式

在日本看来，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重塑问题并不是一个“将来时”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日本在对华供应链合作的前景层面至少存在三种可能的局面。

第一，选择深化和加强中日供应链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建立“紧密协作型”的中日供应链合作模式。在这种情形下，中日之间将保持和深入推进覆盖东亚乃至全球的镶嵌型、耦合式供应链合作网络，夯实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基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日牵引下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助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等更高水平的亚太区域内经济协定早日签订落实，共建东亚经济命运共同体。

第二，选择“有限合作型”的中日供应链合作与竞争模式。即，主动达

^① 参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2020年5月22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20zfzbg.htm> [2021-06-14]；《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网，2020年10月30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10/30/nw.D110000renmrb_20201030_1-01.htm [2021-06-1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中国新闻网，2020年12月18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12-18/9365827.shtml> [2021-06-14]。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1年7月31日。

成与美国等盟国或准盟国在一些高端产业上的供应链深度合作，形成所谓“共享价值观”的供应链联盟；与此同时，在数字技术、移动通信、先进半导体等尖端科技领域调整与中国的供应链合作。其政策核心是重点支持日本数字技术和绿色节能等发展潜力巨大的产业快速成长、壮大，构建本土化、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甚至不排除在一些尖端技术、高端产业上对华设限、限供或断供的可能；但在中低端产业或敏感度较低的产业领域，仍奉行对华合作，继续把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红利与商业机会。即，在不同层次和维度上实行竞争与合作相协调的供应链调整战略，意图构筑一种复合型、交叉式、多元化的东亚供应链网络。

第三，建立独立于中国的新供应链体系，制定“全面对冲型”的中日供应链竞争模式。这种情形下，中日供应链分工模式更多的将是分离型、对抗式的，两国的商业竞争将大于相互合作，这有可能引致中日、中美之间彻底陷入经济冷战危机，甚至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两个或多个恶性竞争或相互排斥的平行市场，全球供应链体系加速分散化、碎片化。

日本在考量后疫情时代涉及日本的供应链分工体系问题上，至少存在经济、安全与价值观取向三个维度上的平衡与取舍。在日本看来，“紧密协作型”的合作模式尽管从长远看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但从安全与价值判断两个层面而言都无法符合其国家利益，而且随着中日综合国力差距日渐拉大，日本丧失战略自主性和沦为中国“经济附庸”的可能性还会变大，这也是为何日本政府一再强调面向“友好国家”构筑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网络和加入美国所主导的“供应链联盟”的原因所在。而“全面对冲型”的合作模式将给日本经济产业界尤其是对华贸易投资领域带来近乎毁灭性打击，同时也会恶化中日各领域的双边关系，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样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基于此，同时参考日本政府近期的一系列官方表态和政策措施，可以认为：日本已决心在后疫情时代选择“有限合作型”的中日供应链合作模式。

（二）中国的应对

第一，面向后疫情时代，构建全方位、综合性、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全体系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之一，居于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节点。2021 年 1 月 24 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2020 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 1630 亿美元，超过美国（1340

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首选目的地。^① 外商对华投资规模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拥有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华产品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利用中国发达的供应链体系和便利的物流网络。从2020年日本对外贸易数据来看,日本对亚洲的进口额为346435亿日元、出口额为392202亿日元,均占日本当年进出口总额的50%以上;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50819亿日元,占出口总额的22.0%,首次超过两成,也超过了日本对美出口,创下十年来新高;日本自华进口额为174931亿日元,占进口总额的25.8%;对华进出口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均为最高。^② 尽管日本政府期待摆脱供应链网络过度依赖中国的局面,但现实打破了这一幻想。对中国而言,在后疫情时代构筑全方位、综合性、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至关重要,其关系到最基本的国计民生和战略发展的潜在空间。从工业制造能力的横向维度来看,必须要保持和完善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的工业供应链体系;从纵向维度来看,必须要引导和建立起梯度分明、深耕精做的供应链体系,构筑起面向未来、瞄准前沿领域尤其是以先进数字与绿色产业为重点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在地理空间上,推进地域平衡、因地制宜的供应链网络布局,避免产业空心化与资源低效配置,提高对供应链网络的自主可控能力,成为日本“离不开”“甩不掉”的供应链合作方。

第二,提高核心技术与高端制造的科研攻关能力,加大对基础性、前沿性研究的资源投入力度,优化研发投入结构。科学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一国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1995年到2017年,中国用于研发的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57%提升至2.15%,研发经费投入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都居世界前列,但与美日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2.5%甚至3%以上相比,^③ 仍存在一定的存量资本差距和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国际上通常将研发投入按用途分为试验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三类,与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研发经费投向试验研究的比例超过80%,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60%的水平,反映了中国在创新和前沿领域的加速追赶态势,但在同样重要

^① 向洋:《参考快评|中国从美国手中夺得这个冠军,意义非凡!》,参考消息网,2021年1月26日, [http://m.cankaoxiaoxi.com/kuaiping/20210126/2433175.shtml?fr=mb\[2021-02-03\]](http://m.cankaoxiaoxi.com/kuaiping/20210126/2433175.shtml?fr=mb[2021-02-03])。

^②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3年版』、2021年6月、66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2021-08-08]。

^③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https://data.cnki.net/NewHome/Index\[2020-08-25\]](https://data.cnki.net/NewHome/Index[2020-08-25])。

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严重不足，亟待优化调整。技术是助力一国产业提质升级的原动力，也是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要素，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关键程度。比如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涌现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一批世界级的领头企业。以此为背景，日本丰田公司决定最早 2022 年在中国生产燃料电池车（FCV）的核心系统，而此前核心系统的生产仅限于日本国内。^① 丰田公司决定在中国生产电动车的核心系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中国企业在技术储备和研发上拥有较大优势，在电动汽车供应链网络中居于较高层级地位。电动汽车产业领域，中国目前处于第一梯队，是相关行为体绕不开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第三，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与物流业、金融业的交互融通式发展。中国已制定了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经济战略，关键点是支持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国内的发展壮大，^② 进而带动制造业整体的提质升级。疫情期间，中国鼓励制造业与物流业、金融业的交互融通式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复工复产进程和供应链的快速有效运转，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助力先进制造业茁壮成长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与之相对应的是，机械制造业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传统优势产业，以 2020 年为例，日本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约为 68.4 万亿日元，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占 21.1%，通用机械占 19.2%，电气设备占 18.7%，三者合计占出口总额的 60% 左右，出口项目结构连续五年保持不变。^③ 可见，汽车、机电及半导体产业等相关制造业是日本对外贸易的命脉所在，日本在这些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技术积淀和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从这一层面来看，建设和完善中国相关先进制造业是保证中日在重点产业供应链上达成合作的基础条件。疫情期间，丰田公司决定其纯电动汽车（EV）使用的电磁钢板部分采用宝武钢铁集团的产品，这也是日本大型车企首次在日本国内生产乘用车中采用中国企业的高功能钢材。^④ 不仅如此，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

① 《丰田将在中国生产燃料电池车核心系统》，日经中文网，2021 年 3 月 24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car/44192-2021-03-24-09-13-03.html> [2021-04-01]。

② 侯彦全：《以先进制造业集群畅通制造业双循环》，《经济参考报》2021 年 4 月 6 日，http://www.jjckb.cn/2021-04/06/c_139861057.htm [2021-06-10]。

③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令和 3 年版』、2021 年 6 月、62 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uhaku2021/pdf/2021_zentai.pdf [2021-08-08]。

④ 《丰田采用中国电磁钢板 质量逼近日企》，日经中文网，2020 年 7 月 14 日，<https://cn.nikkei.com/china/ccompany/41276-2020-07-14-01-11-06.html> [2020-07-27]。

后，为满足医院、餐饮店、酒店等货物搬运需求，日本 NEC 公司开始在日本国内租售由北京云迹公司生产的大容量行李配送机器人。^① 上述事例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成长进步与提质升级，将有助于中日之间供应链网络的紧密衔接。

第四，践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战略，确保东亚区域内供应链合作的畅通。2020 年 11 月 15 日，包含东盟和中日韩澳新等 15 国，涵盖全球 29.7% 的人口、28.9% 的 GDP，历时八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② 标志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中日之间首次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双方都意义重大。2021 年 6 月 25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宣布：内阁会议已批准 RCEP，完成了国内核准程序。日本是继新加坡和中国之后，第三个完成 RCEP 国内核准程序的国家。^③ 日本政府较快批准 RCEP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预期 RCEP 能够为日本带来甚至大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经济提升效应。根据日本财务省 2021 年 6 月发布的相关统计，截至 2021 年 5 月，日本对华出口已连续 11 个月正增长，2021 年 3 月到 5 月连续保持了 20% 以上的增长；同时，自华进口也连续四个月保持正增长。^④ 这反映出中日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以此为背景，RCEP 的签署无疑将给区域内产业合作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东亚地区产业分工合作联系紧密、供应网络结构完善、区域内经济融合互补性好，RCEP 的签署生效将有助于东亚区域经济融合、形成统一的大市场，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供应链合作在东亚地区的自由畅通。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东亚地区现存 RCEP、CPTPP 以及各种双边和多边 FTA，区域经济合作水平有限，相关供应链合作仍存在一定障碍。RCEP 的签署不会打断日本的供应链重组政策，反而可能加速日本推动在华日企迁移到劳动力、土地价格更具优势的东南亚地区，一些关税的减免与归零也可能会大幅减缓在华日企投资建厂的动力。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有所显

① 《NEC 旗下公司开始在日本租售中国云迹机器人》，日经中文网，2020 年 8 月 21 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41757-2020-08-21-11-11-24.html> [2020-08-29]。

② 商务部：《钟山部长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0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1/20201103015923.shtml> [2020-11-17]。

③ 「RCEP 協定受諾を閣議決定」、『日本経済新聞』2021 年 6 月 25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52PD0V20C21A600000/> [2021-07-25]。

④ 財務省「令和 3 年 5 月分貿易統計（速報）の概要」、2021 年 6 月 16 日、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gaiyo2021_05.pdf [2021-07-06]。

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2021 年 7 月公布的《第 50 次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概要》相关数据,截至 2019 年末,日本海外法人公司数为 25693 家,其中制造业 11199 家、非制造业 14494 家;从日本海外法人公司数量的占比来看,中国从 2012 年 33% 的最高点下降至 29.7%,而东盟从 2010 年的 23% 逐年上升到 2019 年的 28.5%,基本接近中国的水平。^① 这反映出日本对东盟市场的重视程度日渐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对拜登政府重返 TPP 抱有较大期待的前提下,RCEP 对于促进中日供应链合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鉴于此,中国须主动引导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保障区域内供应链合作的自由通畅。2020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商务部有关中国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开放态度的回应,^② 就释放出中国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强力信号。

展望未来,同时面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双重冲击的日本进退维谷。后疫情时代,日本将对华采取“有限合作型”供应链合作模式,在数字与绿色产业等重点领域推动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体系,加强与“共享价值观国家”的供应链合作。疫情冲击了本已脆弱的日本经济,也宣示着“安倍经济学”多年成就的幻灭。受其影响,日本主动选择“全面对冲型”对华供应链合作模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供应链网络重组和关键产业本土化生产将是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应对措施。

后疫情时代,日本在坐享中国经济发展机遇和巨量市场带来经贸好处的同时,或将坚定地选择重构关键产业供应链,支持供应地多元化和核心供应链本土化,优化生产结构,提前布局新工业发展的前沿领域。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网络重塑已成定局,日本的供应链重组政策也是推动全球供应链网络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日本选择重组供应链网络,中国应从建立现代化的供应链体系、提升核心技术研发实力、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实施区域融合发展等层面入手,破解对日技术依赖的困局。作为在世界生产供应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两大经济体,经济上常态性合作、区域内融合性发展、战略上深度博弈,或许将成为中日两国关系在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责任编辑:叶琳)

^① 经济产业省「第 50 回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概要」、2021 年 7 月 30 日、8 页、<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7/20210730011/20210730011-1.pdf>[2021-08-11]。

^② 于佳欣、王雨萧:《商务部: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开放态度》,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19/c_1126761835.htm[2021-06-09]。

internal balancing, Japan makes efforts in promoting economic security policy and building offensive military capacity. Meanwhil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lliance doubt” in conducting external balancing, Japan takes two major measures to keep the United States by making use of issues of “two Seas” and building a “quasi – alliance” system and attract it into Asia. Of course, Japan’s counterbalancing against China also faces various formida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and dilemmas, which has left some room for manoeuvre in the strategic turnaround of China – Japan relations. At a macro level, as the essence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s China, balancing leads to the strained politic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for China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in its efforts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Japan.

The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Promotion of Japan’s FOIP

Cheng Yu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s mostly centered on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entraliza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norms has begun to shake,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advocates of norms has also begun to reflect the dual – track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Under the model of dual track, Japan’s promotion of Free and Open Indo – Pacific (FOIP) shows obvious swing. In the era of FOIP 1.0, Japan focuses on building a “centralized” model of norm emerge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India as the normative core. In the era of FOIP 2.0, Japan has shown a “decentralized” postur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building consensus with China and ASEAN. In the era of FOIP 3.0, although Japan still shouted the slogan of respecting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ASEA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 spirit of the Quad” and Japan’s full Participation in ASEAN’s Outlook of Indo – Pacific, the advocacy mode of standardized generation shifted back to the “centralized” mode again. The swing will continu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However, the so – called “The spirit of the Quad” is essential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concepts advocated by many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countries in the Indo – Pacific reg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ness, this exclusive collectivism is not suitable for governing various global problems faced by today’s human societ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egional norms in the Indo – Pacific region ultimately needs to follow the “decentralization” model of norm emergence and promote the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The Remodeling of Japan’s Supply Chain and Its Prospects

Chen Youjun and Zhao Lei

The epidemic has impacted the already fragil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In the post – epidemic era,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network is a foregone conclu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pidemic has highlighted the necessit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has also brought more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formed by the long-term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facing threats and is suffering from multiple impacts from factors such as the epidemic, China-US strategic games,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Faced with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Japan will consider reorganizing its supply chain network, improving supply chain flexi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local relocation and diversified supply of core indust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Japan will adopt a “limited cooperation”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model with China,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controllable, safe and reliable” supply chain system in key areas such as digital and green industries, and strengthen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sharing values”.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star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supply chain system, enhance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upgrade of manufacturing,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o respond to the adjustment of Japanese supply chain policies.

Japan’s “Mega – FTA” Strategy: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Gao Wensheng and Zhang Yongtao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mega – FTA” is the result of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Japan’s FTA strategy, which represents a new trend of Japan’s free trade. Japan’s “mega – FTA” strategy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features mainly include simultaneous promotion, key breakthroughs, flexibil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igh – standard” trade rule template, so as to lead the final goal of promoting the FTAAP. The “mega – FTA” strategy is the embodiment of Japan’s Asia –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trategy, which contributes to Japan’s further acquisition of the right to speak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strategic level, and the change of Japanese regime has increased the uncertain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Japan’s “mega – FTA” strategy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ree trade area from three aspects of trade rules, trade environment and strategic layout, and it is worth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it.

対外均衡における「同盟の懸念」問題を解決するため、「二つの海」によって米国を引きとめると同時に「準同盟」体制を構築し、それにアジアを引き入れるための二つの主要措置を講じている。もちろん、日本の対中バランスは、さまざまな内外の制約やジレンマにも直面しており、中日関係は戦術的転換の余地を残している。マクロレベルでは、日本の対中安全保障戦略の本質であるバランスを採ることは、中日間の政治的および安全保障関係の緊張化につながり、中国が日本との関係改善も困難にしている。

日本の「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構想」の推進における「中心化」と「脱中心化」

程 蘊

近代以降、国際規範の形成は大体西側諸国を中心に行われた。だが、多くの発展途上国の台頭によって、伝統的な規範が形成した「中心化」モデルは揺らぎ始め、規範提唱者の動きも「中心化」と「脱中心化」の両方面の要素を含めた複線的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日本の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推進は振り子のように揺れ続けていた。FOIP 1.0において、日本は規範提唱者の日米豪印を中心にした「中心化」モデルを構築した。FOIP 2.0において、日本は中国、ASEAN 諸国とともに協議・建設を行い、コンセンサスの形成を図る「脱中心化」の動きを見せた。FOIP 3.0において、日本はなおもASEAN 中心性を尊重する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を叫んでいるが、「日米豪印の精神」の発表とASEANのAOIPへの全面的介入によって、規範の形成の動きは再び「中心化」の方へ向かった。今後、以上に述べた往復運動は続くであろう。だが、いわゆる「日米豪印の精神」は本質からいえば、インド太平洋地域諸国が唱えている「多角化」と「包容性」などの理念と相容れない。そして、有効性から見れば、この排他的な集団主義はグローバルな問題の解決にあまり役立たない。そのため、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で新たな国際規範を構築するには、「脱中心化」のモデルに沿って、関係各国との「共商、共享、共建（共に話し合い、共に建設し、共に分かち合うこと）」を行う必要がある。

コロナショック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再構築とその展望

陳 友駿 趙 磊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は世界の脆弱な政治・経済構造に衝撃を与えた。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において、グローバル・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ネットワークが再構築されることは確実である。同時に、新型コロナの流行は中日経済協力の必要性をより鮮明に示し、より不確実で複雑な要因を多くもたらした。中日両国の長期的な産業分業と協力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サプライチェーン体制は脅威にさらされており、新型コロナの流行、中米

の戦略的駆け引き、技術ナショナリズムなどによる影響を受けている。中米の戦略的駆け引きと経済分野・科学技術分野での競争を前にして、日本は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ネットワークを再編し、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よりフレキシブルにし、核心産業の本土回帰と多元的な分散供給の推進を考えている。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に、日本は中国に対して「限定協力型」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協力モデルをとり、デジタルやグリーン産業などの重点分野で「自主的でコントロール可能な、安全で信頼できる」サプライチェーン体系の確立を促し、「価値観を共有する国」と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協力を強化する。これに対し、中国は現代的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体制の確立、コア技術の研究開発実力の向上、製造業の質のアップグレードの推進、地域の融合発展などのレベルから、日本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政策の調整に対応する必要がある。

日本の「メガFTA」戦略：変遷・特徴・評価及び中国への影響

高 文勝 張 永濤

「メガFTA」を大いに推し進めるのは、日本のFTA戦略の深化の結果であり、日本の自由貿易の新たな動向を示している。日本の「メガFTA」戦略は形成期と発展期を経て発展した。その実施の特徴としては、「同時推進、重点突破、臨機応変」を旨としていること、「高基準」の貿易規則モデルを構築し充実させること、アジア太平洋自由貿易圏をリードしていくのを最終目標とする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メガFTA」戦略は、日本のアジア太平洋経済協力戦略を体現しており、国際貿易ルールでの発言権を強めるのに役立つが、戦略面においては、米国の制約から抜け出すのが難しい。また、政権交代は戦略実施における不確実性を増大させた。貿易規則、貿易環境、戦略配置においては、日本の「メガFTA」戦略は、中国の自由貿易区の構築と発展に比較的に大きな影響をもたらすため、その推移を見守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